

2023

05月

总第39期

侵权责任研究

The Research on Tort Law

张珂晶律师/摄

➤ 新法速递

➤ 专业论文

张海英律师：《论完善仲裁的救济途径》

➤ 案例分析

➤ 委员风采

杨松林 上海瀚英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玉萍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振宇 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律师协会
侵权责任业务研究委员会



侵权法律研究

主管

上海市律师协会

主办

上海市律师协会
侵权责任业务研究委员会

顾问

曹志龙

主任

方诗龙

副主任

刘红丹、潘雄、张锴

执行主编

潘雄

编委会成员

方诗龙 刘红丹

潘雄 张锴

孔丽 项蓉

张海英

责任编辑

张珂晶 郝永坤

封面照片

张珂晶

封底照片

张珂晶

目 录

一、新法速递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1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20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	23
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管理暂行办法	25
关于修改《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8
二、专业论文	29
论完善仲裁的救济途径	30
三、案例分析	34
案例 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35
四、委员风采	38

新法速递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2023 年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态安全布局
第三章	生态保护修复
第四章	生态风险防控
第五章	保障与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防控生态风险, 保障生态安全,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制定本法。

第二条 从事或者涉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相关活动, 适用本法; 本法未作规定的, 适用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本法所称青藏高原, 是指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全部行政区域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第三条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自然恢复为主,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坚持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科学防控、系统治理。

第四条 国家建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协调机制, 统筹指导、综合协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 审议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 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问题, 督促检查相关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相关工作。

第五条 青藏高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风险防控、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等责任。

青藏高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加强协作, 协同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第六条 国务院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组织编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专项规划, 组织实施重大生态修复等工程, 统筹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在本行政区域组织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专项规划。编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专项规划, 应当进行科学论证评估。

第七条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土地、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冰川、荒漠、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调查, 开展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健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生物多样

性、水文、气象、地质、水土保持、自然灾害等监测网络体系，推进综合监测、协同监测和常态化监测。调查、评价和监测信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享。

第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与研究，加强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修复、水文水资源、雪山冰川冻土、水土保持、荒漠化防治、河湖演变、地质环境、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治、能源和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研究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长期研究工作，掌握青藏高原生态本底及其变化。

国家统筹布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科技创新平台，加大科技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充分运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与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科技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中的支撑作用。

第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青藏高原传统生态文化遗产，弘扬青藏高原优秀生态文化。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宣传和科学普及，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高全民生态文明素养，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参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相关活动。

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宣传报道，并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十条 对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生态安全布局

第十一条 国家统筹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布局，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优化以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态系统碳汇等为主要生态功能的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地。

第十二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当落实国家对青藏高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有关要求，细化安排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涉及青藏高原国土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第十三条 青藏高原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应当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青藏高原生态空间内的用途转换，应当有利于增强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湿地、冰川、荒漠等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态保护红线内人类活动的监督管理，定期评估生态保护成效。

第十四条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状况，按照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从严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应当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

第十五条 国家加强对青藏高原森林、高寒草甸、草原、河流、湖泊、湿地、雪山冰川、高原冻土、荒漠、泉域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巩固提升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阿尔金山草原荒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藏东南高原边

缘森林生态功能区、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珠穆朗玛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

第十六条 国家支持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国务院和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在青藏高原重要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分布区、生态环境敏感区以及珍贵濒危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和重要栖息地、重要自然遗迹、重要自然景观分布区等区域，依法设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推进三江源、祁连山、羌塘、珠穆朗玛峰、高黎贡山、贡嘎山等自然保护地建设，保持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

第十七条 青藏高原产业结构和布局应当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适度发展生态旅游、特色文化、特色农牧业、民族特色手工业等区域特色生态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在青藏高原新建、扩建产业项目应当符合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严格执行自然资源开发、产业准入及退出规定。

第三章 生态保护修复

第十八条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修复，实行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

第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加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对依法设立的国家公园进行系统保护和分区分类管理，科学采取禁牧封育等措施，加大退化草原、退化湿地、沙化土地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的力度，综合整治重度退化土地；严格禁止破坏生态功能或者不符合差别化管控要求的各类资源开发利用活动。

第二十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青藏高原雪山冰川冻土保护制度，加强对雪山冰川冻土的监测预警和系统保护。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大型冰帽冰川、小规模冰川群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重要雪山冰川实施封禁保护，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人为扰动。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冻土区保护范围，加强对多年冻土区和中深季节冻土区的保护，严格控制多年冻土区资源开发，严格审批多年冻土区城镇规划和交通、管线、输变电等重大工程项目。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雪山冰川冻土与周边生态系统的协同保护，维持有利于雪山冰川冻土保护的生态环境。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青藏高原江河、湖泊管理和保护制度，完善河湖长制，加大对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等重点河流和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色林错、纳木错、羊卓雍错、玛旁雍错等重点湖泊的保护力度。

青藏高原河道、湖泊管理范围由有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科学划定并公布。禁止违法利用、占用青藏高原河道、湖泊水域和岸线。

第二十二条 青藏高原水资源开发利用，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坚持科学开发、合理利用，统筹各类用水需求，兼顾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保障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第二十三条 国家严格保护青藏高原大江大河源头等重要生态区位的天然草原，依法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障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发挥最基本、最重要作用的草原划为基本草原。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青藏高原草原保护，对基本草原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和管理，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草原生态保护修复。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优化草原围栏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草原原生植被，科学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实施黑土滩等退化草原综合治理。

第二十四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统筹协调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落实草畜平衡，科学划定禁牧区，防止超载过牧。对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的草原和生态脆弱区的草原，实行禁牧、休牧制度。

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合理利用草原，不得超过核定的草原载畜量；采取种植和储备饲草饲料、增加饲草饲料供应量、调剂处理牲畜、优化畜群结构等措施，保持草畜平衡。

第二十五条 国家全面加强青藏高原天然林保护，严格限制采伐天然林，加强原生地带性植被保护，优化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健全重要流域防护林体系。国务院和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在青藏高原重要生态区、生态状况脆弱区划定公益林，实施严格管理。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科学实施国土绿化，因地制宜，合理配置乔灌木植被，优先使用乡土树种草种，提升绿化质量，加强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草原火灾防范。

第二十六条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湿地保护修复，增强湿地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功能，提升湿地固碳能力。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湿地保护协调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湿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的要求，优化湿地保护空间布局，强化江河源头、上中游和泥炭沼泽湿地整体保护，对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的湿地进行综合整治和修复。

禁止在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若尔盖等泥炭沼泽湿地开采泥炭。禁止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等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青藏高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耕地基础地力，增强耕地生态功能，保护和改善耕地生态环境；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采取养用结合、盐碱地改良、生态循环、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式，科学利用耕地，推广使用绿色、高效农业生产技术，严格控制化肥、农药施用，科学处置农用薄膜、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林业草原、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开展野生动植物物种调查，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实施保护措施的意见，完善相关名录制度，加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和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对野牦牛、藏羚、普氏原羚、雪豹、大熊猫、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黑颈鹤、川陕哲罗鲑、骨唇黄河鱼、黑斑原鲌、扁吻鱼、尖裸鲤和大花红景天、西藏杓兰、雪兔子等青藏高原珍贵濒危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实行重点保护。

国家支持开展野生动物救护繁育野化基地以及植物园、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强对青藏高原珍贵濒危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救护和迁地保护。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致害综合防控。对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牲畜、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九条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完善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

第三十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采取荒漠化土地封禁保护、植被保护与恢复等措施,加强荒漠生态保护与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

第三十一条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封禁抚育、轮封轮牧、移民搬迁等措施,实施高原山地以及农田风沙地带、河岸地带、生态防护带等重点治理工程,提升水土保持功能。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三江源、祁连山黑河流域、金沙江和岷江上游、雅鲁藏布江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等重要江河源头区和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治理区,人口相对密集高原河谷区的水土流失防治。

禁止在青藏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确因国家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需要建设的,应当经科学论证,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严格控制扰动范围。

第三十三条 在青藏高原设立探矿权、采矿权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要求。依法禁止在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等江河源头自然保护地内从事不符合生态保护管控要求的采砂、采矿活动。

在青藏高原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应当采用先进适用的工艺、设备和产品,选择环保、安全的勘探、开采技术和方法,避免或者减少对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生态环境敏感区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应当符合相关管控要求,采取避让、减缓和及时修复重建等保护措施,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三十四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采取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土地复垦、恢复植被、防治污染等措施,加快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加强对在建和运行中矿山的监督管理,督促采矿权人依法履行矿山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责任。

在青藏高原开采矿产资源应当科学编制矿产资源开采方案和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新建矿山应当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生产矿山应当实施绿色化升级改造,加强尾矿库运行管理,防范和化解环境安全风险。

第四章 生态风险防控

第三十五条 国家建立健全青藏高原生态风险防控体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自然灾害防治、气候变化应对等生态风险防控能力和水平,保障青藏高原生态安全。

第三十六条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灾害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雪崩、冰崩、山洪、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森林草原火灾、暴雨（雪）、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工程建设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及时采取工程治理或者搬迁避让等措施。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自然灾害综合治理，提高地震、山洪、冰湖溃决、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防御工程标准，建立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相适应的自然灾害防治工程和非工程体系。

交通、水利、电力、市政、边境口岸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运营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自然灾害防治义务，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加强工程建设、运营期间的自然灾害防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十八条 重大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生态和地质环境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工程沿线生态和地质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状况，制定沿线生态和地质环境监测方案，开展生态和地质环境影响的全生命周期监测，包括工程开工前的本底监测、工程建设中的生态和地质环境影响监测、工程运营期的生态和地质环境变化与保护修复跟踪监测。

重大工程建设应当避让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徙洄游通道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修建野生动物通道、迁地保护等措施，避免或者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与野生动植物的影响。

第三十九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青藏高原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组织开展种质资源调查与收集，完善相关资源保护设施和数据库。

禁止在青藏高原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因科研、有害生物防治、自然灾害防治等需要采集或者采伐的，应当依法取得批准。

第四十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分工，统筹推进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实行外来物种引入审批管理，强化入侵物种口岸防控，加强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监测、预警、控制、评估、清除、生态修复等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第四十一条 国家加强对气候变化及其综合影响的监测，建立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气候系统、水资源、珍贵濒危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雪山冰川冻土和自然灾害影响的预测体系，完善生态风险报告和预警机制，强化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影响和高原生态系统演变的评估。

青藏高原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开展雪山冰川冻土消融退化对区域生态系统影响的监测与风险评估。

第五章 保障与监督

第四十二条 国家加大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的财政投入，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生态风险防控等。中央预算内投资对青藏高原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予以倾斜。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

第四十三条 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提高转移支付系数、加计生态环保支出等方式，对青藏高原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予以补偿。青藏高原省级人民

政府应当将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全面纳入省级对下生态保护补偿转移支付范围,促进生态保护同民生改善相结合。

国家通过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探索确定青藏高原生态产品权责归属,健全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鼓励青藏高原特色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形成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第四十四条 国家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提供支持,实行有利于节水、节能、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的金融、税收政策,鼓励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

国家鼓励和支持公益组织、社会资本参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开展生态产品开发、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等活动。

第四十五条 国家支持在青藏高原因地制宜建设以风电、光伏发电、水电、水风光互补发电、光热、地热等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加强清洁能源输送通道建设,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除保障居民用电和巩固边防需要外,禁止在青藏高原新建小水电项目。

第四十六条 在青藏高原发展生态旅游应当符合资源和生态保护要求,尊重和维护当地传统文化和习俗,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开发青藏高原生态旅游产品、设计旅游路线,合理控制游客数量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规模。

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遵守安全规定和文明行为规范,符合区域生态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管控和规范要求;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猎捕和采集野生动植物。

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自行带走产生的垃圾或者在指定地点投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生活垃圾。

第四十七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污水、垃圾收集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内部以及周边毗邻地带生态保护修复,统筹规划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青藏高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和乡村绿化,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塑造乡村风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各类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依法公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相关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

单位和个人有权依法举报和控告污染青藏高原环境、破坏青藏高原生态的违法行为。

第四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提高科技化、信息化水平,建立执法协调机制,对重大违法案件和跨行政区域、生态敏感区域的违法案件,依法开展联合执法。

第五十条 国家实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绩效评价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提升、生态保护成效、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等纳入指标体系。

第五十一条 国家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司法保障建设,鼓励有关单位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提供法律服务。

青藏高原各级行政执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查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违法行为或者办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公益诉讼等过程中,发现存在涉嫌犯罪行为的,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具有侦查、调查职权的机关。

第五十二条 青藏高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级人民政府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在履行相关职责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其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青藏高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 (一) 在国家公园内从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造成生态破坏;
- (二) 在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若尔盖等泥炭沼泽湿地开采泥炭或者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
- (三) 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 (四) 采集或者采伐国家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
- (五) 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 (六) 破坏自然景观或者草原植被;
- (七) 猎捕、采集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利用、占用青藏高原河道、湖泊水域和岸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并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或者不恢复原状的,强制拆除或者代为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长江、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怒江等江河源头自然保护区内从事不符合生态保护管控要求的采矿活动的,由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设备、工具;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新建小水电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责令恢复原状,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旅游、山地户外运动中随意倾倒、抛撒生活垃圾的,由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九条 污染青藏高原环境、破坏青藏高原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修复责任、赔偿损失和相关费用。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由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确定。

第六十二条 青藏高原省、自治区和设区的市、自治州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具体办法。

第六十三条 本法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014 年 11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安全防范
第三章	调查处置
第四章	保障与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反间谍工作，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反间谍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积极防御、依法惩治、标本兼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第三条 反间谍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本法所称间谍行为，是指下列行为：

(一)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二)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

(三)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以及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或者策动、引诱、胁迫、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的活动；

(四)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的网络攻击、侵入、干扰、控制、破坏等活动；

(五) 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

(六) 进行其他间谍活动。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组织或者其他条件，从事针对第三国的间谍活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适用本法。

第五条 国家建立反间谍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反间谍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研究、解决反间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

公安、保密等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加强协调，依法做好有关工作。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

第八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反间谍工作秘密。

第九条 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个人和组织给予保护。

对举报间谍行为或者在反间谍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条 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第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的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于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应当保密。

第二章 安全防范

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承担本单位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的主体责任，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措施，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教育，动员、组织本单位的人员防范、制止间谍行为。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管理本行政区域、本行业有关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协调指导、监督检查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将反间谍安全防范知识纳入教育、培训、普法宣传内容，增强全民反间谍安全防范意识和国家安全素养。

新闻、广播、电视、文化、互联网信息服务等单位，应当面向社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反间谍宣传教育。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根据反间谍安全防范形势，指导有关单位开展反间谍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

第十四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第十五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专用间谍器材。专用间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

第十六条 任何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向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组织举报的，相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理。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将受理举报的电话、信箱、网络平台等向社会公开，依法及时处理举报信息，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十七条 国家建立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管理制度。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应当建立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制度，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要求，明确内设职能部门和人员承担反间谍安全防范职责。

第十八条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工作人员反间谍安全防范的教育和管理，对离岗离职人员脱密期内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义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应当加强对涉密事项、场所、载体等的日常安全防范管理，采取隔离加固、封闭管理、设置警戒等反间谍物理防范措施。

第二十条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应当按照反间谍技术防范的要求和标准，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加强对要害部门部位、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的反间谍技术防范。

第二十一条 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有关规划，应当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和划定的安全控制区域，征求国家安全机关的意见。

安全控制区域的划定应当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科学合理、确有必要的原则，由国家安全机关会同发展改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保密、国防科技工业等部门以及军队有关部门共同划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动态调整。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反间谍工作需要，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反间谍技术防范标准，指导有关单位落实反间谍技术防范措施，对存在隐患的单位，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进行反间谍技术防范检查和检测。

第三章 调查处置

第二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依法行使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职权。

第二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工作证件，可以查验中国公民或者境外人员的身份证明，向有关个人和组织问询有关情况，对身份不明、有间谍行为嫌疑的人员，可以查看其随带物品。

第二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出示工作证件，可以查验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查验中发现存在危害国家安全情形的，国家安全机关应当责令其采取措施立即整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存在危害国家安全隐患的，可以予以查封、扣押。

对依照前款规定查封、扣押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在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形消除后，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解除查封、扣押。

第二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阅、调取有关

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有关个人和组织应当予以配合。查阅、调取不得超出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所需的范围和限度。

第二十七条 需要传唤违反本法的人员接受调查的，经国家安全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本法的人员，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照规定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应当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在被传唤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其住所进行询问。

国家安全机关对被传唤人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可能适用行政拘留或者涉嫌犯罪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为被传唤人提供必要的饮食和休息时间。严禁连续传唤。

除无法通知或者可能妨碍调查的情形以外，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在上述情形消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传唤人家属。

第二十八条 国家安全机关调查间谍行为，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对涉嫌间谍行为的人身、物品、场所进行检查。

检查女性身体的，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第二十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调查间谍行为，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涉嫌间谍行为人员的相关财产信息。

第三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调查间谍行为，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对涉嫌用于间谍行为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被调查的间谍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第三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在反间谍工作中采取查阅、调取、传唤、检查、查询、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应当由二人以上进行，依照有关规定出示工作证件及相关法律文书，并由相关人员在有关笔录等书面材料上签名、盖章。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有关间谍行为的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有关个人和组织应当如实提供，不得拒绝。

第三十三条 对出境后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中国公民，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可以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不准出境，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

对涉嫌间谍行为人员，省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知移民管理机构不准其出境。

第三十四条 对入境后可能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活动的境外人员，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可以通知移民管理机构不准其入境。

第三十五条 对国家安全机关通知不准出境或者不准入境的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不准出境、入境情形消失的，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及时撤销不准出境、入境决定，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

第三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发现涉及间谍行为的网络信息内容或者网络攻击等风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的职责分工，及时通报有关部门，由其依法处置或者责令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及时采

取修复漏洞、加固网络防护、停止传输、消除程序和内容、暂停相关服务、下架相关应用、关闭相关网站等措施，保存相关记录。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措施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责令有关单位修复漏洞、停止相关传输、暂停相关服务，并通报有关部门。

经采取相关措施，上述信息内容或者风险已经消除的，国家安全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作出恢复相关传输和服务的决定。

第三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和身份保护措施。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法规定，涉嫌犯罪，需要对有关事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进行鉴定以及需要对危害后果进行评估的，由国家保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部门按照程序在一定期限内进行鉴定和组织评估。

第三十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经调查，发现间谍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侦查。

第四章 保障与监督

第四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第四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调查间谍行为，邮政、快递等物流运营单位和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第四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因执行紧急任务需要，经出示工作证件，享有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优先通行等通行便利。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时，依照规定出示工作证件，可以进入有关场所、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出示工作证件，可以进入限制进入的有关地区、场所、单位。

第四十四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或者依法征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等，必要时可以设置相关工作场所和设施设备，任务完成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恢复原状，并依照规定支付相应费用；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

第四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因反间谍工作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提请海关、移民管理等检查机关对有关人员提供通关便利，对有关资料、器材等予以免检。有关检查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第四十六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因执行任务，或者个人因协助执行反间谍工作任务，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保护、营救。

个人因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国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保护措施。

个人和组织因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四十七条 对为反间谍工作做出贡献并需要安置的人员，国家给予妥善安置。

公安、民政、财政、卫生健康、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保障、移民管理等有关部门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做好安置工作。

第四十八条 对因开展反间谍工作或者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导致伤残或者牺牲、死亡的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抚恤优待。

第四十九条 国家鼓励反间谍领域科技创新，发挥科技在反间谍工作中的作用。

第五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加强反间谍专业力量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训练，提升反间谍工作能力。

对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政治、理论和业务培训。培训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提高专业能力。

第五十一条 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内部监督和安全审查制度，对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和纪律等情况进行监督，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安全审查。

第五十二条 任何个人和组织对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都有权向上级国家安全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国家安全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检举人、控告人。

对支持、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者依法检举、控告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实施间谍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个人实施间谍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十五日以下行政拘留，单处或者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单处或者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并可以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

明知他人实施间谍行为，为其提供信息、资金、物资、劳务、技术、场所等支持、协助，或者窝藏、包庇，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有前两款行为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单处或者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单处或者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相关单位、人员违法情节和后果，可以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撤销登记。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作出行政处理的情况及时反馈国家安全机关。

第五十五条 实施间谍行为，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给予奖励。

在境外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间谍组织、敌对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者入境后直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五十六条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未按照本法规定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义务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责令改正；未按照要求改正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约谈相关负责人，必要时可以将约谈情况通报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产生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予以警告、通

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使用、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件，或者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拒不配合数据调取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 （一）泄露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秘密；
- （二）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
- （三）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任务；
- （四）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 （五）明知是间谍行为的涉案财物而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
- （六）对依法支持、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打击报复。

第六十一条 非法获取、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以及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家安全机关予以警告或者处十日以下行政拘留。

第六十二条 国家安全机关对依照本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一）涉嫌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 （二）尚不构成犯罪，有违法事实的，对依法应当没收的予以没收，依法应当销毁的予以销毁；
- （三）没有违法事实的，或者与案件无关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返还相关财物；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六十三条 涉案财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或者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 （一）违法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收益，供实施间谍行为所用的本人财物；
- （二）非法获取、持有的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
- （三）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的专用间谍器材。

第六十四条 行为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相关人员，因行为人实施间谍行为为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获取的所有利益，由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采取追缴、没收等措施。

第六十五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以及没收的财物，一律上缴国库。

第六十六条 境外人员违反本法的，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可以决定限期出境，并决定其不准入境的期限。未在规定期限内离境的，可以遣送出境。

对违反本法的境外人员，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决定驱逐出境的，自被驱逐出境之日起十年内不准入境，国务院国家安全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六十七条 国家安全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实施。

第六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九条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有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违反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行为，依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七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以外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职责，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

第七十一条 本法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

(1993 年 7 月 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4 月 26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身建设,使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根据宪法和有关规定,总结实践经验,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应当遵守本守则。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己任,做到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为建设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而积极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忠于宪法,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坚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认真履职,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妥善处理履行职责和其他工作的关系。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廉洁从政各项规定,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个人私利,不得干涉具体司法案件。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持续加强履职学习,认真参加常务委员会安排的专题学习和其他学习,坚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本领。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注重学习以下内容: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三）宪法、法律；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六）履职所需的法律知识和其他专业知识。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依法履职，遵守法定程序，遵守会风会纪，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出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的，应当通过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委员长书面请假。

办公厅应当向委员长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的情况和缺席的原因。

每次会议由办公厅将会议出席情况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应当遵守议事规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前，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就会议议题做好审议准备。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各项工作。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和分组会议上的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进行。

第十六条 出席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履行参加表决的法定职责，并服从依法表决的结果。

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付表决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再对该议案发表意见，但与表决有关的程序问题除外。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向常务委员会反映情况，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严格落实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要求，加强与基层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吸纳和反映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掌握实情、找准问题，使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依照规定参加常务委员会组织的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参加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可以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参加执法检查、视察和调研活动，应当严格落实党中央规定要求，减少陪同人员，厉行勤俭节约。

第十九条 参加专门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积极参加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遵守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规则和制度。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凡属规定不应当公开的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外事活动中，应当模范遵守外事纪律，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积极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讲好中国民主故事、中国法治故事。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严重违反本守则的，应当向委员长会议作出书面检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违法违纪的，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守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近期，演出市场加快恢复，各类演出活动大量增加，在繁荣文化市场的同时，个别演出活动发生现场安全事故，部分热门演出存在“黄牛”炒票等问题，影响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充分发挥演出市场在促消费、稳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文化市场高质量发展，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是严格执行演出市场主体准入制度。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依法对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实施行政许可，依法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进行备案，认真审核相关资质条件，全面纳入行业监管。

二是全面加强演出活动审批管理。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依法做好演出活动的审批工作，将属于营业性演出范围的农村集镇演出、流动性演出纳入审批管理，严格审核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演出场所备案证明》等资质文件，统一审批要求，做好内容监管。法律法规规定演出活动需要取得安全、消防等批准文件的，要督促演出举办单位在演出前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对不符合法定审批要求的，坚决不予批准。

三是持续做好演出场所监管。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定期对演出场所进行检查，核查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检查记录、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等材料，督促演出场所定期开展设施设备检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督促演出场所根据有关要求，对进入演出现场的观众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或者管制器具进入演出现场。督促演出场所建立完善现场巡查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演出活动的巡查，做好现场观众管理，坚决防止拥挤、踩踏等事故发生，确保演出现场安全。

四是重点加强大型演出活动现场监管。对临时搭建舞台、看台的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演出活动，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做好演出现场监管，查验演出举办单位的演出批准文件及相关手续，核验演员信息及演出节目内容，严禁擅自变更演员及演出内容，严禁假唱、假演奏等违法违规行为。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坚决防范演出安全事故发生。

五是切实规范演出票务市场秩序。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将社会关注度高、票务供需紧张的营业性演出作为重点监管对象，提前进行研判。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 70%。对在票务经营中发现有炒票问题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及时约谈演出举办单位和演出票务经营单位，督促整改。要联合属地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打击“黄牛”炒票、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六是压实演出举办单位主体责任。演出举办单位是演出市场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督促演出举办单位对演出内容、票务经营、

演员组织、现场管理等进行全流程把控，积极配合做好行业监管。特别是对从事杂技表演等危险性较高的演出项目，要督促演出举办单位做好演员和现场观众的安全防护，为演员购买相关安全保险，做好现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七是加强营业性演出市场执法办案。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对违法违规营业性演出活动的查处，严查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擅自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未经批准出售演出门票等行为。加强营业性演出活动现场监管，重点查处擅自变更演出内容、假唱、假演奏、演出内容含有禁止情形等问题。密切关注热门营业性演出活动票务经营情况，查处演出经纪机构未履行应尽义务等违规经营行为。及时公布营业性演出市场执法典型案例，加强普法宣传教育，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3 年 4 月 21 日

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开展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相关业务,保护境内外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利率互换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互换通”是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连接,参与香港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机制安排。

本办法适用于“北向互换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外投资者)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清算、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参与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

“南向互换通”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第三条 “北向互换通”遵循内地与香港市场现行法律法规,相关交易、清算、结算活动遵守交易、清算、结算发生地的监管规定及业务规则。本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条 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并完成银行间债券市场准入备案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互换通”参与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开展以风险管理为目的的衍生品交易。

第五条 参与“北向互换通”的境内投资者应当是具有较强定价、报价和风险管理能力,具备良好国际声誉,具备支持开展“北向互换通”报价交易的业务系统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境内金融机构法人。境内投资者开展“北向互换通”业务前,应当与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内电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境内电子交易平台)签署“互换通”报价商协议。

第六条 境内外投资者开展“北向互换通”交易,可以与交易对手签署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主协议或其他协议。境内投资者应当就协议签署情况进行备案。

第七条 “北向互换通”初期可交易品种为利率互换产品。“北向互换通”利率互换的报价、交易及结算币种为人民币。

第八条 境外投资者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境外电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境外电子交易平台)与境内电子交易平台的连接,向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发送交易指令。

“北向互换通”交易在境内电子交易平台达成,交易一经达成即视为交易已完成确认。存续合约的转让应当通过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开展,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以下简称境内清算机构)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认可的结算所(以下简称境外清算机构)通过清算机构互联互通,共同向境内外投资者提供清算、结算服务。

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应当及时将适用集中清算的交易结果发送至境内外清算机构进行清算、结算。境内清算机构应当及时通过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向境内外投

资者反馈交易是否已进入集中清算。被境内外清算机构拒绝进入集中清算的交易，应当根据交易双方在交易达成前在境内电子交易平台的约定进行处置。

第十条 境内清算机构和境外清算机构共同进行集中清算交易的跨境资金结算。其中，境外清算机构负责境外参与者的资金结算，境内清算机构负责境内参与者的资金结算和境外清算机构的跨境资金结算。跨境资金支付主要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办理。

第十一条 境内外清算机构之间建立中央对手方清算机构互联，根据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要求及各自中央对手清算风险管理制度分别管理境内、境外两端清算参与者风险，并共同管理相互之间的净额风险，其中包括建立特殊风险准备资源覆盖境内外任一清算机构违约场景下的潜在损失，建立相应违约处置安排控制溢出风险。

任一清算机构违约的，另一清算机构应当按照业务规则及双方之间的清算协议动用风险准备资源完成对违约清算机构的违约处置。守约清算机构可就使用的自有及由其清算参与者出资的风险准备资源向违约清算机构进行追偿。

第十二条 “北向互换通”实行额度管理，并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

第十三条 境内外投资者和相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交易报告库报告“北向互换通”交易相关数据，并妥善保存所有交易相关数据、交流信息记录等。

境内外投资者通过境内电子交易平台达成交易的，可由境内电子交易平台代为报告。境内电子交易平台为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交易报告库的，无需另行报告。

第十四条 境内外电子交易平台和境内外清算机构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并传输交易、清算等数据，根据法律法规、“北向互换通”相关的监管要求和业务规则规范使用境内外投资者“北向互换通”数据。

境内清算机构等有汇报责任的机构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报送跨境人民币收支信息。境内清算机构、境内投资者等相关主体应当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及有关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第十五条 境内外电子交易平台和清算机构应当共同对“北向互换通”相关交易、清算活动进行监测，监控跨境异常交易行为。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履行交易监测职能，境内清算机构履行清算监测职能，境外电子交易平台、境外清算机构应当配合内地基础设施机构开展市场监测。

境外投资者应当强化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配合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开展市场监测，防范交易风险。

第十六条 境外投资者可使用自有人民币或外汇参与“北向互换通”交易和清算。使用外汇参与交易和清算的，可在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及香港地区经批准可进入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的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以下统称香港结算行）办理外汇资金兑换。香港结算行由此所产生的头寸可到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平盘。使用外汇参与交易的，其交易到期或不再继续参与的，原则上应当通过香港结算行兑换回外汇。境外投资者应当在一家香港结算行开立人民币资金账户，用于办理“北向互换通”下的资金汇兑和结算业务。

第十七条 “北向互换通”下的资金兑换纳入人民币购售业务管理。香港结算行应当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人民币购售业务等相关规定，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真实性审核、信息统计和报送等义务，并对境外投资者的自有人民币和购售人民币以适当方式进行分账。

香港结算行在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平盘头寸时，应当确保与其相关的境外投资者在本机构的资金兑换，是基于“北向互换通”下的真实合理需求。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北向互换通”进行监督管理，并与香港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管合作安排，共同维护投资者跨境投资的合法权益，加强反洗钱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法对“北向互换通”下人民币购售业务、资金汇出入、信息统计和报送等实施监督管理，并与香港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其他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监督管理机构加强跨境监管合作，防范利用“北向互换通”进行违法违规套利套汇等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及相关监管部门有权调取境外投资者交易、清算等与“北向互换通”投资活动相关的数据。

第十九条 对违反法律法规、本办法以及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等有关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依法采取监督管理措施；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境内电子交易平台和境内清算机构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北向互换通”相关业务规则。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对“互换通”有关交易清算结算等安排进行调整。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4 月 28 日起施行。

关于修改《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建〔2023〕5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现对《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10 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中的“实施期限至 2022 年”修改为“实施期限至 2025 年”。

二、将第三条第一款“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重点支持范围”中的“（一）节能减排体制机制创新；（二）节能减排基础能力及公共平台建设；（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节能减排；（四）重点关键节能减排技术示范推广和改造升级；（五）其他经国务院批准的支持范围”修改为“（一）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二）充电基础设施奖补清算；（三）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四）循环经济试点示范项目清算；（五）节能降碳省级试点；（六）报经国务院批准的相关支出”。

三、将第十一条中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修改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在第十一条后增加一款“各级财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专业论文



论完善仲裁的救济途径

作者：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张海英律师

摘要：仲裁作为众多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以其“一裁终局”的显著特点得到国内外社会普遍认可。当仲裁裁决存在失当、裁定无效、裁定内容违法等情形时，司法监督作为救济途径，采取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方式，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仲裁的救济途径尚需进一步完善。因此，可以考虑完善重新仲裁制度，以使司法监督对仲裁裁决的救济能够在支持仲裁的原则下，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关键词：仲裁 诉讼 救济途径 不予执行 司法监督

正文：仲裁制度是民商事争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自愿约定争议发生时，提交至选定的仲裁机构根据一定程序规则和公正原则作出裁决，并有义务履行裁决的一种法律制度。仲裁属自愿型，有别与诉讼强制型公断。诉讼程序中，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甚至很多时候还能申请再审，法院在二审和再审时会对法律的适用和事实的认定以及司法程序进行重新审查，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多一份保障。但对仲裁而言，救济程序启动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很好的实现救济的效果。

一、中国目前的救济途径运用现状和原因

（一）中国目前仲裁救济途径的运用现状

国内仲裁裁决中当事人请求撤销仲裁委员会裁决的，根据我国《仲裁法》第58条规定，下列情形可向仲裁委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1、没有协议的；2、裁决事项超出协议范围或超出裁决权力范围的；3、仲裁违反法定程序；4、仲裁依据伪造证据作出的；5、当事人隐瞒的证据足以造成裁决不公的；6、仲裁员收受贿赂，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另外，如果法院认为仲裁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予以撤销。

针对涉外仲裁裁决，我国实行形式审查制度。就是只对仲裁程序性问题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4条的规定，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合议庭审核后，裁定仲裁裁决不予执行：1、无仲裁条款或事后也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2、没有按照规定制定被申请人或非因被申请人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3、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不符合规定；4、仲裁事项超出协议范围或超出仲裁机构权力仲裁的。另外，如果法院认为仲裁有损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应予以撤销。与国内仲裁不同的是，涉外仲裁的合意因素很强，且有诸多国际仲裁方面的规定，我国司法对其监督仅限于程序性的审查。

（二）原因分析

当事人签订仲裁协议是在纠纷发生之前或之后经双方合意达成的，一般来说协议会载明提交仲裁的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仲裁机构在收到当事人申请时会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机构的管辖权以及仲裁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约定的范筹等事项来确定是否立案受理。有的仲裁协议在决定是否受理时就会审查，也是仲裁程序启动的条件，所以在实践中当事人提请撤销裁决的依据运用很少。

证据方面,我国对于证据运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中一般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来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或者是对方当事人隐瞒了重要证据,实践中是很困难的,特殊案件适用举证倒置,但同样收集到证据会存在“瑕疵”,或超出了期限也不提供。仲裁裁定作出后即使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当事人的利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因为司法监督救济程序其实只是针对仲裁程序进行审查,对国内仲裁裁决虽有证据方面的规定,但在实际运用起来却有相当大的难度,更多的还是形式审查。当事人如果对仲裁庭认定的事实或者对适用法律适用有异议根据现行法律是无法寻求司法救济的。

二、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相关立法的规定,司法监督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对存在违法、失当情形的仲裁裁决的救济:其一:根据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其二,根据仲裁法第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由此,上述两种实现方式的同时并存,即形成了司法监督对仲裁裁决的“双重救济”制度。^[1]即是旨在加强对仲裁权的行使的制约,并且避免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因不受约束而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但是,“双重救济”制度实则并未能够实际地体现立法的良好初衷,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理论层面的问题:减损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仲裁中始终贯穿着“当事人意识自治”的原则,应一经由当事人协议授权的仲裁庭作出裁定随即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效力,而不为任意地改变。所以,“仲裁当然应服从法律的管制,但此项管制不能损害仲裁的契约本质”;^[2]司法监督如对仲裁裁决终局性的约束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那么即否定了当事人之于仲裁裁决所欲行使的意思自治,又可能动摇仲裁得以成立的基础。司法监督对仲裁裁决的“双重救济”制度减损了对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根据前述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据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仅限于仲裁裁决所涉的非实体性事项存在违法、失当的情形,而并不涉及仲裁裁决中的实体性问题。对此,尽管有学者基于仲裁的契约性以及由此引申开来的“契约必须遵守”原则进而提出,只要仲裁程序符合自然正义的要求,

当事人即准备接受在法律或者事实方面存在错误的仲裁裁决,^[3]但仅以非实体性事项存在违法、失当的情形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虽然看似能够保障上述学者提出的当事人之于仲裁裁决的意思自治,可由于仲裁裁决所针对的终究是得以实际地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实体性问题,并且仲裁裁决一经撤销又意味着其法律效力被根本地否定,全盘否定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以及作出该裁决的整个仲裁活动,且不予当事人或者仲裁庭任何补正机会的,实则恰恰是在更大程度上减损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其二,针对仲裁裁决本身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决定了其一经作出即约束双方当事人、确定其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效力。因此,除被依法撤销、不予执行之外,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当得到承认。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5款的规定,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否定的同

时也否定了其法律效力的效果,即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在事实上被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所否定,从而造成了所谓的仲裁裁决于法律上有效、而于事实上无效的结果。^[4]由此,就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进行司法监督的不予执行制度违背了执行权设置的本旨,越权地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其法律效力。

(二) 实践层面的问题:当事人无法切实地获得双重救济

我国司法监督对仲裁裁决的“双重救济”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仲裁权行使的制约和对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的约束,为当事人的利益提供更加周全、可靠的保障。然而,结合具体实践的情况,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却并未使当事人切实地获得所谓的双重救济;相反地,还造成了对仲裁裁决的履行的恶意拖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6 条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执行权法院就无法就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是否成立,以及撤销权法院作出的驳回撤销申请的裁定是否正确进行审查,而只得单纯地审查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故,两个管辖法院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后者是对前者的补正关系,因而与其称之为“双重救济”制度,不如说是两种互不相干、相互独立的仲裁裁决救济制度。

前述最高院司法解释第 26 条规定当事人不得以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相同的理由再次申请不予执行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救济权利,恶意地拖延对仲裁裁决的履行。但实践中撤销申请被驳回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向执行权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之后,仍然得以不受时限约束地、随时申请不予执行;而只要该方当事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在表面上不同于申请撤销的理由,执行权法院即必须中止执行程序对此进行审查。故而,上述实践中仍然在事实上造成了对仲裁裁决履行的恶意拖延。

三、完善重新仲裁制度作为我国仲裁裁决的救济途径

司法监督是仲裁裁决的主要救济途径,而目前司法监督对仲裁裁决进行救济的实现方式为前述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却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均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可以考虑完善现行的重新仲裁制度,并以该制度作为仲裁裁决的主要救济途径。^[5]但,由于仲裁法第 61 条就重新仲裁制度所作的规定过于简单,对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均尚未予以明确,因此,为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需要对重新仲裁制度加以完善。

(一) 以当事人作为申请重新仲裁的主体

根据仲裁法第 61 条的规定,重新仲裁程序的启动完全依赖于法院的裁量权,而当事人并不享有主动申请的权利。由于重新仲裁程序是在法院启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后方可启动,而撤销程序的启动又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为前提。在仲裁实践中,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原因,有时并非是对仲裁裁决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希望通过对其中部分违法、失当情形的补正,以更好地、更经济地、更高效地维护自身利益,所以,赋予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后再行申请重新仲裁的权利,实则是对于上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也体现了对有效仲裁的保障。

(二) 将实体性问题纳入申请重新仲裁的理由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1 条第 1 款规

定, 仅在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或者一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情况下, 法院方才得以作出中止撤销程序、发回重新仲裁的裁定, 即上述规定将法院可以主动启动重新仲裁程序的理由限定在了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存在违法、失当情形的情况。对此, 除应当考虑仲裁法第 58 条第 1 款的规定, 将仲裁裁决所涉的程序违法和仲裁员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作为法院据以裁定重新仲裁的理由外, 在确实由当事人提出重新仲裁的申请的情况下, 即应当将仲裁裁决中的实体性问题纳入申请重新仲裁的理由的范围。因为, 在由法院主动启动重新仲裁程序的情况下, 将其据以作出裁定的理由限定在上述仲裁裁决所涉的程序、证据和仲裁员行为存在违法、失当的情形, 可以避免过度的司法监督对仲裁“一裁终局”的特性造成减损; 但在由当事人申请重新仲裁的情况下, 由于实体性问题的理由是由当事人主动提出的, 且仲裁裁决本身所针对的也是实体性问题, 因此, 法院对于上述申请理由的审查应不构成实体干预, 应被视为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以及通过给予仲裁庭自我补正仲裁裁决中的实体性问题的机会。

(三) 重新仲裁的审理范围应当有所限制

由于重新仲裁制度的本旨在于为仲裁庭提供对存在违法、失当情形的仲裁裁决进行自我补正的机会, 以更经济地、效率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因此, 不同于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对一审案件的审理既审查其具体事实又审查其法律适用, 重新仲裁无需就仲裁裁决以及作出该裁决的整个仲裁活动进行全盘的重新审理; 其审理范围应当限于仲裁裁决中确实存在违法、失当情形的那一部分程序、证据、仲裁员行为或者实体性问题, 即法院据以作出重新仲裁裁定的理由,^[6] 而不包括超出仲裁裁决所提出的新的仲裁请求。否则, 即将导致重新仲裁丧失其审理的对象。

四、总结

我国设立的司法监督对仲裁裁决的“双重救济”制度、即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 不仅对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以及当事人的仲裁裁决意思自治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减损, 在实践中并未能够切实地为当事人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双重救济。可以通过完善现行的重新仲裁制度, 为当事人和仲裁庭提供主动地对存在违法、失当情形的仲裁裁决进行救济的机会, 使得司法监督能够合理地进行, 以保障对仲裁裁决的救济得以更经济地、效率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参 考 文 献]

- [1] 江伟, 李浩. 论人 民 法院与 仲裁机构 的新型关系 [J]. 法学评论, 1995 (4).
- [2] [英] 施米托夫. 国际贸易法文选 [M]. 赵秀文译. 1993: 638.
- [3] 陈治东. 国际商事仲裁法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23.
- [4] 肖晗. 建议取消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方式 [J]. 河北法学, 2001 (3).
- [5] 刘沁予. 论作为仲裁裁决救济途径的重新仲裁制度的完善 2015 (10)
- [6] 王小莉. 我国重新仲裁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J]. 仲裁研究, 2009 (3).

案例分析



案例 | 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

来源：微信公众号“知产宝”，发表于 2023 年 4 月 8 日

一、裁判要旨：

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其中，因欺骗性导致对商品特点的误认，包括对商品性质、质量、原料成分、功能用途、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误认。判断标志是否具有欺骗性，应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水平及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指定使用的商品，综合考虑标志本身或其构成要素是否具有欺骗性。

本案中，结合中国政法大学提交的学校信息资料、招生简章、网络宣传资料等证据，可以证明“法大”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已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并大量使用，二者已经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且在高等教育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诉争商标为“法大人”纯文字商标，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法大人公司与中国政法大学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法大人公司在“白酒”等商品上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产品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或与中国政法大学相关，故诉争商标已经构成上述 2013 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二、裁判文书摘要：

- 1、一审法院/案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 73 行初 6289 号
- 2、二审法院/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京行终 287 号
- 3、案由：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
- 4、当事人：
 - （1）上诉人（原审原告）：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2）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知识产权局
 - （3）原审第三人：中国政法大学
- 5、一审裁判结果：驳回法大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 6、二审裁判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7、涉案法条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
 -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

三、审理经过：

上诉人合肥法大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法大人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2）京 73 行初 6289 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

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查明：诉争商标申请人为法大人公司。申请号：15591248。申请日期：2014 年 10 月 28 日。专用权期限至：2025 年 12 月 13 日。

核定使用商品（第33类，类似群3301）：鸡尾酒；果酒（含酒精）；葡萄酒；白酒；伏特加酒；米酒；青稞酒；清酒；黄酒；威士忌。

（2）被诉裁定：国家知识产权局2021年12月13日作出商评字[2021]第357576号《关于第15591248号“法大人”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认定：诉争商标获准注册日期早于2019年11月1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本案的实体问题应适用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3年商标法），相关程序问题适用201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2019年商标法）。诉争商标未违反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诉争商标由文字“法大人”构成，其完整包含“法大”二字。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通常简称为“法大”，中国政法大学与其简称“法大”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宣传已经形成一一对应的特定关系，其在诉争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在教育等多个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合肥法大人公司将“法大人”作为商标核定使用于“白酒”等商品上，易使消费者误认为其商品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或与中国政法大学有关。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已经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之情形。裁定：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法大人公司不服被诉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3）其他事实：商标评审阶段，中国政法大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以下主要证据：1. 中国政法大学信息资料；2. 招生简章、章程；3. 网络宣传资料；4. 商标信息资料；5. 合肥法大人公司及利害关系人相关资料；6. 微信截图；7. 中国政法大学的相关公告、管理办法；8. 合肥法大人公司的相关使用资料等。

原审诉讼阶段，法大人公司向原审法院补充提交了（2022）鄂洪兴内证字第1660号公证书，证明经过法大人公司大范围、长时间宣传和使用，诉争商标在酒类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中国政法大学与“法大”不具有一一对应的特定关系，相关公众对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为“中政大”。

2、一审法院认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诉争商标为纯文字商标“法大人”，结合我国相关公众的认知，“法大”为我国高等学府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二者已经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大”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已经在教育等多个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虽然法大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于中国政法大学就读，但是法大人公司与中国政法大学并无关联，却将“法大人”申请注册在“白酒”等商品上，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故诉争商标已经构成2013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3、一审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法大人公司的诉讼请求。

4、上诉人诉称：

法大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中国政法大学有多个简称，包括“中政大”“中政”，“法大”不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唯一指向，未与其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且在诉争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法大”并非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二、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国政法大学对“法大”简称进行了充分的宣传使用，使得中国政法大学在教育领域之外具有较高知名度。三、“法大人”商标核定使用在“白酒”等食品上，不会使得相关公众对食品特点或来源产生误认。四、诉争商标系法大人公司正常注册并获得授

权，且持续使用至今，也不存在欺骗消费者的主观意图。

5、被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均服从原审判决。

6、二审法院认定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证据采信得当，且有被诉裁定、诉争商标档案、各方当事人在商标评审阶段和原审诉讼阶段提交的证据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7、二审法院认为：

2013 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其中，因欺骗性导致对商品特点的误认，包括对商品性质、质量、原料成分、功能用途、工艺技术等方面的误认。判断标志是否具有欺骗性，应从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水平及认知能力出发，结合指定使用的商品，综合考虑标志本身或其构成要素是否具有欺骗性。

本案中，结合中国政法大学提交的学校信息资料、招生简章、网络宣传资料等证据，可以证明“法大”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已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简称并大量使用，二者已经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且在高等教育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诉争商标为“法大人”纯文字商标，在无其他证据证明法大人公司与中国政法大学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法大人公司在“白酒”等商品上申请注册诉争商标，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产品来源于中国政法大学或与中国政法大学相关，故诉争商标已经构成 2013 年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情形。原审判决及被诉裁定对此认定正确。法大人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诉争商标属于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不能通过使用获得可注册性。法大人公司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8、二审裁判结果：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法大人公司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委员风采





杨松林 律师

上海瀚英律师事务所 律师

教育背景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职务

中国法学会会员

北京市法学会不动产研究会理事

上海市律师协会侵权责任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

业务领域

合同、物权、担保与公司法
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与实务

杨松林，上海瀚英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法学硕士，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在华东政法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是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法学会不动产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律师协会侵权责任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与执业领域为合同、物权、担保与公司法，先后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平安银行等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目前是上海市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法律顾问。师从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韩强教授，关注德国、日本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国内民商法理论发展与研究，曾受邀赴京参与原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起草工作，负责相关条款撰写。在《判解研究》《中国不动产》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接受《东方早报》《第一财经》等媒体专访。曾荣获国家奖学金、优秀律师等多项荣誉。

长期在政府部门、中央企业与金融单位从事法律工作，擅长设计各类诉讼与非诉方案。法律基础扎实，服务经验丰富，深受客户信任。除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外，还曾参加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大型客机研制总装项目谈判，并为政府采购业务及信息化项目提供专门法律顾问服务。对民商法学也有较深入的理论与研究与实践，擅长研究与代理复杂、疑难民商事争议案件。

**杨玉萍 律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

教育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法专业硕士

社会职务

上海市律师协会侵权责任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特邀律师调解员
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巾帼律师团公益律师、上海市妇联、浦东妇联、上海市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等公益律师

业务领域

银行及金融业务、并购与重组、资本市场、公司法务及劳动争议、财富风险管理等民商

杨玉萍律师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之前曾为国内某高校法学讲师、某上市公司法务总监，积累了处理上市公司及公司法律实务的实操经验。

杨律师主要执业领域为银行及金融业务如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与清收及风险控制、并购与重组、资本市场、公司法务及其劳动争议、家事及财富风险管理等民商事法律事务领域。

在银行及金融业务领域，为部分商业银行出具资产管理、不良资产处置、资产清收、声誉风险管理与舆情应对等出具相关法律文件。如为某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数十亿元。

在资本市场领域，负责经办多个资本市场法律业务项目。在并购重组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经办了较多的收并购案件，也曾为跨国公司解决境内投资的法律架构设计、合同谈判、外汇、税收等方面的法律难题。其代表性的案例为为某上市公司并购大型房地产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法律意见；为某上市公司并购某印刷企业进行合同谈判、对该企业下属子公司出具尽调报告、法律意见书，为执行并购方案出具专业法律意见，为某上市公司声誉风险与相关公司谈判并出具相关法律文件。

在争议解决领域，曾多次代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上市公司等多个数亿重大诉讼、劳动仲裁、知识产权等案件，其间包括出具突发舆情的解决方案、声誉风险管控及处置等，诉讼经验较丰富，协调沟通能力强。代理数起知名的公司实务、知识产权领域、侵权纠纷等胜诉案例。

杨律师现在为上市公司、某商业银行、某销售公司、金融管理公司及其它类型的公司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杨振宇 律师

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

教育背景

复旦大学 法律硕士

社会职务

上海市律师协会侵权责任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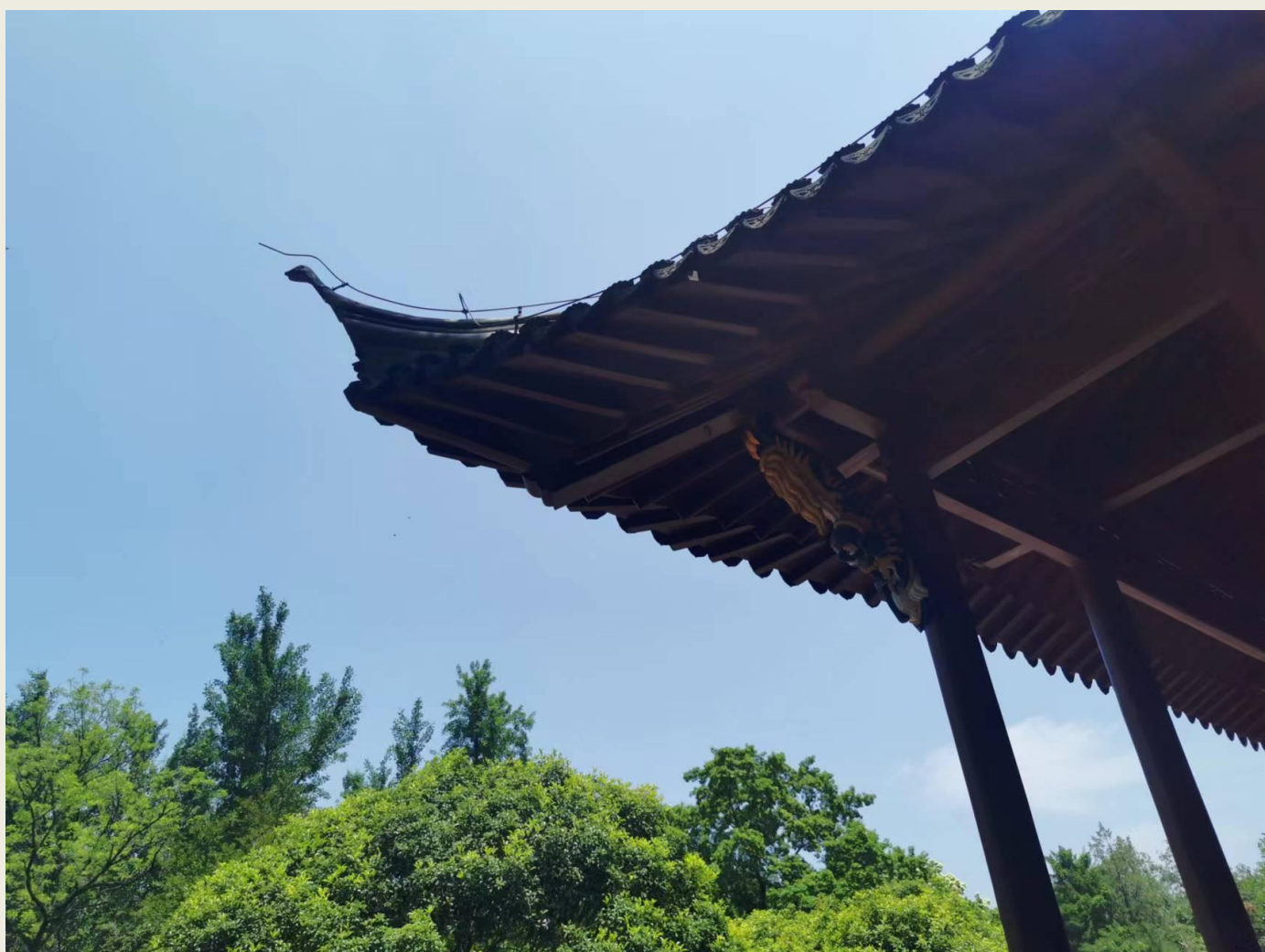
业务领域

民商事诉讼仲裁
刑事辩护

杨振宇律师有丰富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实战经验，成功案例涵盖侵权、房产、借贷、合同、婚姻继承、刑事辩护等领域。一直秉持“靠谱”的执业理念，努力以诚信、专业、高效的工作表现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保护合法权益。

在侵权领域，杨振宇律师办理过上百起各类案件，能够第一时间给出咨询建议、调解与诉讼方案。

兴趣爱好上，喜欢读书、运动、鼓捣数码产品和软件。



张珂晶律师/摄